

## 试论学术性

学术就是对某一学科问题的科学研究，而学术性就是对某一学科问题研究有创造、有新见、有价值的特性，它最集中地表现为能在前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提供新知识。学术性的基本要求是由学术的基本特质决定的：一是所研究的问题必须进入学科，对推动学科建设有积极意义；二是必须有创见；三是论证问题必须具有科学性。提高学术性，最关键的是要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分析问题的深度。在此前提下，一要注意了解和掌握本学科及相邻学科的学术发展动态，努力选择具有较大学术价值、属学科前沿的研究课题；二要培养大胆怀疑的精神，勇于向前人成说挑战，敢于和权威讨论、争鸣；三要善于发现和积累有价值的资料。

“学术性”一词在文化科学领域以至当代社会生活中都具有很高的使用率，然而对其作出科学研究的专门性论文著作至今尚很少见到。鉴于此一问题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普遍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人们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广泛关注和期待，本文试从三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作为初步探讨，以求教于诸方家。

## 一 学术和学术性的新界定

何谓学术和学术性？自近代以来，不断有人思考探究，然而至今尚未形成一致认识。若作一总结，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大致有三：一为“《辞海》说”，认为学术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sup>[1]</sup>；与此相近，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学术性就是理论性。<sup>[2]</sup>二为“二元说”，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应把“学术”与“理论”划开，认定二者“**A**”就是**A**，“**B**”就是**B**；<sup>[3]</sup>其二主张把“学术性与应用性相结合”，明显也是把学术与应用加以分别看待的。<sup>\*</sup>三为“包容说”，认为“学”为学理，或理性认识，“术”指方术、技术，即应用，“学术”在内涵上包容了学理和应用（或理论与应用）这两个因素。<sup>[4]</sup>这三个说法中第三说在当前为较多人所接受。

上述几种看法，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术和学术性的某些本质特征，但从总体上看，有的存在着片面性，有的未能抓住学术之所以为学术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还不能算是对学术和学术性含义的较为准确、科学的界定。仔细分析，“《辞海》说”虽概括了学术的主要含义，但却不够全面。学术既包括对学科领域中较为系统的问题的研究，也不排斥对其中某些不够系统的具体问题的研究，甚至要对一些枝节问题作出考证；作为学术成果的表现形态既可以是反映系统而专深的理论、学说的论著，也可以是应用、对策性的研究报告以及考辨、释疑等其他各种各样形式的学术文章。以“系统、专门的学问”概括学术的含义未免失

<sup>\*</sup>《北京大学校史稿》，转引自《中国大学学报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5 页。

之片面。“二元说”与“包容说”都着重从学术与理论、应用三者的关系上考察问题，只注意了学术的表现形式或范围对象，还未能揭示出其本质特征。究其根源，这两种观点或受蔡元培先生的影响，或直接承袭了蔡先生的说法，有必要加以考究。

蔡元培先生是近代较多也较早论及学术含义的一位先哲。他第一个对学术的内涵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给我们以很大启发。他在讲到学术时，明显是把人们习惯上经常连用的“学术”这一术语中的“学”和“术”在意义上加以分别对待的，认为：“学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侧重点在于纯粹科学的研究；“术”，侧重点在于讲究实际应用。他举例说：“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目的，终身以之。”“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他还特别论述到了“学”和“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论何种学问，都是先有术后有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两者始可并进”；“学为基本，术为枝干，不可不求其相应”。\* 由上所引可以看出：蔡元培所谓“学术”是包括了“学理”（即理论）和“应用”两部分的。就“学术”的包容范围而言，蔡先生的看法有其价值，但不尽全面，有待补充。学术是对学科问题的研究，学科就其大的方面分，既有基础理论学科，又有应用技术学科；而每一个学科都不但有其基本理论问题和应用问题，而且也还有史的问题。哲学有哲学史，文学有文学史，语言有语言史，法律有法律史，经济有经济史等等。除此而外，各门学科中也还有既不属理论、

参见《北京大学校史稿》，转引自《中国大学学报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应用，又不属史的其他问题，这些也不应被排斥在学术范围之外。因此，仅把学术理解为理论和应用两部分，显然是狭隘的。作为对“学术”概念界定的科学性说，蔡氏之说仅揭示了其对象、范围，并未涉及其根本性质，因而也是缺乏深刻性的。

对学术和学术性的界定，应既有对象范围的界说，又有对其性质特征的规定。由此，我认为：学术，就是对学科问题的科学研究。其基本含义有二：一是研究的对象范围是某一学科领域内的问题，不仅是学科领域中的理论、应用、历史问题，而且包括了与本学科相关的所有问题；二是这种研究必须对某一学科的建设有价值、有积极意义。而学术性，就是对某一学科问题的研究有创造、有新见、有价值的特性。其基本的特征是：能够在前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提供新知识——或提出了新问题，开拓了新领域；或得出了新观点，构建了新理论；或发掘了新资料，作出了新论证；或转换了新角度，运用了新方法。对学术及学术性作如是界定，既规定了其范围、对象，又揭示了其实质，是比较科学也较为符合学术研究的实际的。一篇论文或一部专著，其选择研究的问题愈重大（属本学科中带有基本性质的重要问题或某一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焦点、难点问题）、愈先进（属本学科中处在前沿的尖端问题），理论的分析论证愈深入、透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资料愈翔实、可靠（尤其是发掘、使用了前人未发现的新鲜资料，如考古发掘的地上地下文物古迹等资料），得出的结论愈新颖、科学，该论著的学术价值就愈大，学术水平就愈高。反之，学术价值就不大，学术水平就不高。

## 二 学术性的基本要求

学术性的基本要求，是由学术的基本特质决定的，并且应该

从学术研究的事实中来加以总结。对此，前人尚未论及。我认为，学术性的基本要求应有三点。

1. 所研究的问题必须进入学科，而且对推动学科建设和发展有积极意义

我国社会科学门类齐全，种类繁多，据有关部门提供的统计资料，现已有正式学科、专业达 169 个。<sup>\*</sup> 目前，尚有一些新出现的学科、专业已具备独立的条件，但尚未得到正式认可，如编辑学等。在这些学科中，大的门类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历史、教育、心理等；小的门类，如史学领域里有方志学、史料学，文学领域里有红学、莎学等，哲学领域里有王学、关学等，心理学领域里有航空心理学、人事心理学、编辑心理学等。学术研究，必须围绕这些学科选择课题，这是学术性的起码要求。

选题是否进入学科，具有学科性，这在理论上是不成问题的，但在实践中，在事实上，许多作者、编辑却常常感到难以把握。一些作者往往拿着自己的稿子找编辑打问是否适合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也有些编辑常常为判定一篇稿件是否属于学术论文而作难。台湾学者谢延庚认为“学术论文有其特定的体裁”，并且列举出六种类型的论文不能算作学术论文：（1）读书心得或摘要；（2）教科书式的文章；（3）未提出主要论点只作引述的文章；（4）单一资料来源写成的文章；（5）以经不起考验的论点作依据写成的文章；（6）掠人之美或有剽窃之嫌的文章。<sup>[5]</sup>谢氏的看法

章学新：《面向实际，办好学报》，《华中师院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6期。根据韩寿根等主编的《学科大全》（沈阳出版社1986年版）提供的最新统计，目前在书刊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学科有2200多个，其中属哲学社会科学的有700多个。本文对学科作动态的、发展的理解：随着社会生活和科技文化的发展，新的学科将会不断地产生和出现。

基本是对的，他列举的不能算作学术论文的六种类型的文章对我们颇有启发。我认为，判定某一研究是否进入学科，具有学术性，除了从文章体式（国内尚有人提出要从文章题目考察<sup>[6]</sup>）着眼外，主要应从内容出发，应当划清以下几个界限：

（1）工作总结、工作问题研究与学科问题研究的界限；

（2）感想、体会与有新见并作出了分析论述的文章的区别；

（3）教材、讲义式文章与专门深入探讨某一问题的文章的区别；

（4）“应景”、“配合”形势的宣传与理论联系实际，探索、解决现实问题文章的区别；

（5）纯客观的描述、介绍（未提出问题、未得出结论）与围绕问题分析论证或作出科学评价或得出新结论的文章的区别。

作为学术性的要求，其关键是首先要进入学科。然而进入学科者并非都自然就具有了学术性。一篇学术论文或一部学术论著只有既以学科问题为对象，又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即选题对学科建设有积极意义，才算达到学术性的要求。

选题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所研究探讨的问题：

首先，要有普遍性或代表性，这是最基本的。学术论著的选题一般应从对代表性论著、流行看法的研究中提出和确定，尤其是讨论、商榷类的研究，选择的问题最好是在本学科产生了一定影响的问题，是在较大范围内公开流传（公开发表或在大型会议报告）甚至是被相当多的人公认的一些成说。对于那些私下交谈中发现的问题，或复习提纲之类读物中出现的差错，并不被人们承认的观点等，进行研究、讨论和争鸣，一般是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的。

其次，选择的问题应尽量具有较大价值。每一学科中值得研究的问题都很多，从对促进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作用看，它们有着

大小轻重之分。应当尽量选择对学科建设起较大推动作用的问题加以研究，如推翻前人的某一结论、成说，开拓一个崭新的领域，以及对某一领域中重要薄弱环节的研究等。

再次，选择的问题愈先进对学科建设愈具有积极意义。选题的先进性集中表现在，敢于对本学科中处于前沿的问题、影响本学科建设和发展、人们普遍关心而又一时不能解决的难题的研究。

以上仅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事实上，学术选题的价值大小、先进与否是一个复杂问题，不好一概而论。例如寇效信先生的《秦汉乐府考略》<sup>[7]</sup>一文，通过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秦代编钟关于乐府的记载，提出了乐府产生时代的研究课题。经过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并与出土文物相互印证，考明在秦代已有乐府，从而否定了流传一千余年的“汉武始立乐府”之说，这不仅纠正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错误，而且对于中国音乐史、中国古代史等学科的研究都具有较大影响与意义。一般若从表面简单地看，这一选题不能说是大问题，但若从实际影响看，这一选题的价值、意义却不能说是小，它不仅在一个学科而且同时在诸多学科中产生了震动。

## 2. 必须有创见

有创见，是科学研究论著最重要的特质，也是学术性的最集中的体现。学术论著的创见，主要的表现形式为：一是提出一个全新的课题，开拓一个崭新领域（如甲骨学的产生）；二是或否定、或纠正了前人的某一理论、成说，提出了新理论、新观点（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关系论）；三是完善、补充前人的理论、观点（如王英志“奇正”关系说<sup>[8]</sup>）四是发现提供了新的资料（如《秦汉乐府考略》中关于秦代编钟上秦乐府的记载）；五是理论并无新推进，但针对现实生活中某些新问题，而

显示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威力（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对纠正十年动乱“左”的路线造成的危害、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起到了重大的理论先导作用）。

故意标新立异，追求轰动效应，不能算创新。创新是需要得到社会承认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新见都可得到编辑出版者进而得到社会的承认，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有的新见却不能为当时人所接受，甚至被视为异端邪说者也屡见不鲜。哥白尼的日心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当时都受到世人的抨击，尔后才得到承认。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也被错误地加以批判。现在，经过了历史的淘洗，证明了其见解的正确，终于得到了肯定，显示了真理的光辉。在善于发现、支持新的理论、观点，并使之得以公开发表，得到社会承认方面，学术编辑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能够发挥特殊的作用。

### 3. 论述问题要有科学性

在讲到学术论著的时候，学术性和科学性往往是并列出现的两个概念。本来，科学性是学术性的基本特质或要求，只是因为它太重要了，因此才出现了并列连用的普遍情况。

学术论著的科学性集中表现在分析问题的实事求是，征引资料的可靠准则，得出的结论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提出的观点、学说能达到自圆其说。

(1) 分析问题要有理论根据和事实根据。既然学术研究是对某一作为专门系统学问的学科中的理论、应用或史的问题的研究，因此其成果表现的基本形式必然是理论的形态（年谱等形式成果除外）。分析问题，就是运用一定的理论来分析、解释某一事物、现象，揭示其本质规律。在学术论著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作武器。这个理论就是前人和今人经过科学研究探索总结出来，并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结论和观

点。它既包括基本的理论又包括各学科的专门的理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学术理论工作者，最重要的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分析、评价事物。另外，也要注重以各学科的理论作指导分析、说明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也无法代替具体的学科理论，但谁也无法否定它是分析、解决社会历史问题的一把金钥匙，许多学者集一生探索之经验教训，都不得不承认，在当今众多学说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是最先进最科学的理论，无论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都无法与之相比；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混沌一片的社会历史现象中拨开层层迷雾，重现真理光辉。对这一点，前些年在一些人的思想上产生了动摇，出现了混乱，实在是历史的曲折和误会。

所谓有事实的根据，就是要在分析问题时不要仅仅用理论来分析问题，而且还要从事实（包括历史、现实）出发来归纳、提炼理论，用实践来验证真理。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讲清道理。列宁有一句名言：分析问题，不是把理论与理论作对比，而是要把理论与事实作对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跋文中引述俄国学者考夫曼评论他的论证方法时也说过：“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sup>[9]</sup> 这些都不是否定理论在分析问题中的作用，而是强调了让事实说话、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极端重要性。

## (2) 所引资料要全面、准确、可靠

这里的全面，并非要把有关的资料一一罗列，而是说引证资料，不能失之片面，不能为我所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在学术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不良学风：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常常摘引、挑选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回避与自己观点相左的资

料。这是违反科学原则的行为。列宁曾讲到：“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物和玩弄事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了。罗列一些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的个别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sup>[10]</sup>科学性本身要求从事实的全部总和及其联系中把握事实，否则就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科学的结论不但能够涵盖与之相符合的事实，而且必须达到能够解释一切与之相对立的事实。

所谓准确，就是要抓住引证的资料的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不能掐头去尾，违背甚至歪曲原意。必须无差错，不能以讹传讹。这就要求尽量做到援引的是第一手资料。

所谓可靠，就是要善于辨别资料的真伪，选用最真实的资料。在各种形式的资料中，可信度是有一定区别的。一般来说，考古发现的文物资料要比文献资料更可靠。而在文献资料中，档案资料要比回忆录等资料更可靠；第一手资料要比第二手资料更可靠；亲自调查研究所得资料要比他人提供的资料更为可靠。

### (3) 无知识性错误

科学研究是以已知求未知，绝对不允许出现知识性差错。尤其是关于社会、人生、历史、地理、人物、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等方面，都应当绝对准确；关于统计数字、年代、人名、地名等绝不能马虎，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但是这些年来，因为学风不正，一些人的论著中常常错误百出。知识上的差错，是影响学术水平的“硬伤”。

### 三 提高学术性的途径

要提高学术性，最重要的是要增强研究问题的深度。正如一个小说家的创作只有对生活观察得细致，认识得深刻，才能透过现象把握生活的本质，达到反映的深刻，创作出感人至深的不朽之作一样，撰写学术论著也只有翻阅大量的文献资料，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问题真正有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认识深刻，才有可能写出有深度、有力度的学术论著。对此，朱光潜先生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可以再研究。他在 1962 年发表的《漫谈说理文》<sup>[11]</sup>中讲到：他写作时，“只是对要说的道理先有些零星片断的想法”，“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对要说的道理总要有情感，如果对它毫无情感，勉强敷衍公事地把它写下去，结果就只会是一篇干巴巴的应酬文字，索然无味。如果对它有深厚的情感，就会兴致淋漓，全神贯注，思致风发，新的意思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在朱先生看来，写作论说文，事先可不必先对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作过细的研究，只要有些零星片断的想法，主要的是依赖激发情感，只要有了情感就能从笔下源源不断地涌出新意来，这对撰写学术论文似乎不很妥当。我们承认情感是推动人们从事科研和写作的重要动力因素，但情感再强烈、再充沛，也无法取代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如果没有对问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仅靠情感绝不能涌出新意思，写出有深度的理论文章来。朱先生认为，“不想就不能写，不写也就很难得明确周全”。这很有些道理，但也不尽然。我们承认，科学研究和学术论文写作，二者的确是互相联系互相推动的：我们常常感到在动笔之前一些想清了的问题在写作过程中变得模糊了，需要重新进行研究、思考，写作过程中常常伴随着研究的深化，对问题认识的进

一步的透彻、明晰。但这绝不是说，论文的写作就是研究，研究也就是写作，这二者是二而一的。社会科学论著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一种记录，应当先有研究，甚至是数年长期不懈的阅读、思考、探索，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理论，进而才能谈到借诸文字表现出来，敷衍成鸿篇巨制。研究和写作应该是科研的两个不同阶段。论文不是写出来的，而更重要的是研究有所得的结晶。由此，我认为，提高学术论著的水平，首要的是提高作者的学识水平、科研能力。有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有了系统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基本知识，有了研究问题的正确方法，以及刻苦顽强的钻研精神，再加上较高的文字表达能力，就一定能写出高水平的学术论作来。

这是我对提高学术性途径的总看法。在这个总看法之下，具体有三点值得注意。

1. 要注意了解和掌握学术动态，努力选择具有较大学术价值、属学科前沿的研究课题

从事科学研究，从课题说，只要需要，本应无问题大小、轻重之分；无论选择何种题目，只要能开拓新的领域或提出新的看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一两个问题，都是有价值的，都是科学研究所需要的。但是，从较高的层次要求，学术问题的确还存在一个大与小、难与易、轻与重、复杂与单一等等的区别。爱因斯坦说过，科学研究不应是只在板子上找最薄的地方钻洞，而应找那最厚、最难钻的地方去钻洞，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某一重大难题的解决，往往意味着这门学科一次新的突破的到来。选择这类问题作为研究项目，应有较坚实的理论准备，要有敢于攀登学术高峰的勇气和毅力。对于初搞研究的人来说，一般先应选择一些较易论述清楚的问题，等打好了功底，积累了经验再攻克难题。

与问题大小相联系，选题还要注意先进性。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站在时代思想的高度，选择那些社会和人民急需回答的重要问题加以研究。如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等，就很值得许多学科探讨研究。另外，新兴学科以及各个学科都因文、理两大学科的相互渗透以及各学科间的相互交叉不断产生出新的边缘性课题，都值得重视和研究。

要做到从以上两方面选择好研究的问题，关键在于对学术研究动态的及时了解和掌握上，只有对本门学科以至相邻学科的最新成果以及发展趋势有及时全面的掌握，知道这一学科在讨论什么问题，哪些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了，还有哪些是重大问题有待解决，攻克什么问题能对学科建设起到推动作用，产生突破性影响，才有可能选好符合自己实际的有价值的课题，避免选题上的重复。掌握动态贵在坚持，不坚持、有间断，就会事倍功半。

## 2. 要有大胆怀疑的精神，勇于讨论和争鸣

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时说：“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所束缚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sup>[12]</sup>怀疑，是科学研究的起点；批评，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方法。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学习、创造、否定、再创造的不断发 展演进的过程。科学研究上任何一点创新，都必须建立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因此，对已有成果首先应当认真学习、研究和吸取其精华，同时又不能就此满足，必须善于发现其不完善、甚至疏漏错误之处。这就需要有大胆的怀

疑精神、批判的眼光。历史上许多不朽之作，都是由怀疑前人的结论入手，而抓住了问题，找到了症结，推动了学术理论的发展。当然，怀疑要有根据，怀疑的根据是已有的理论与理论、理论与事实、事实与事实之间的问题和矛盾。怀疑的关键在于学术敏锐性。这种敏锐性是由包括理论基础厚实，思维能力良好，想象、联想丰富等在内的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目前哲学社会科学论著内容的实际考察，几乎绝大多数都带有商榷的因素或干脆就是与人讨论、争鸣某一问题的。这类论著都是以发现已有成果中的问题（或是错误的结论，或是某些观点的不完善，或是论证的偏颇、资料上的差错）开始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展开论述的。从这个意义说，没有讨论、争鸣，就没有真正的科学研究。商榷性的文章，容易写，但又不易写好。我以为有三点要注意：（1）应从整体上抓住他人问题的要害，选择有价值的题目做文章，要通过商榷、争鸣辨明真理，推动该问题研究的深入；（2）要能把支持对方观点得以成立的几个最重要的论据驳倒，论证推翻，即能釜底抽薪；（3）能树立起自己的新的理论、观点，且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 3. 要善于发现和积累有价值的新资料

自然科学的研究主要靠实验，社会科学研究除一些涉及现实问题尤其是对策性的研究需要主要依靠对社会实际的调查外，大多数学科依靠的是文献资料。因此，能否积累和掌握较丰富的文献资料尤其是一些新鲜的资料，就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张岱年先生认为：“在选定论题之后，就要对于从古到今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进行广泛的考察，有时对于间接有关材料，也要加以调查。”他指出：“掌握关于某一问题的全部资料，这种方法，过去有一个比喻，叫作‘竭泽而渔’，即研究某一问题，要把所有与这个问题有关材料一个不漏地阅看一遍。

经过‘竭泽而渔’的工夫，写出的论文，就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就不易驳倒，就有重要的学术价值。”<sup>[13]</sup>张先生的要求是高标准，不易做到。但最起码，也要能把有代表性的资料都翻阅过，否则，这研究就成问题。马克思撰写《资本论》，遍读了当时西方各国全部有关经济的材料。列宁写《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阅读了当时西方几百种关于哲学、物理学的著作和论文。郭沫若在讲到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也自称把整个先秦史料都给“剿翻了”。这些先哲们为我们研究学术树立了典范。

积累资料最基本的方法是：（1）要坚持对自己研究领域里的重要论著做好标题索引，读过或看到了来不及细读的一律加以索引，以便日后翻阅；（2）在阅读论著时对一些重要的观点和材料要作摘要笔记或摘录卡片，也可全文复印或重点复印有关章节，并分类保存之；（3）对阅读思考中自己的发见和看法写成长短不一的读书笔记或札记，这一点特别重要，文字可不讲究。如此长期坚持，就可能围绕某一学科某一问题积累较丰富的资料，发现问题，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理论，写出有见解而又资料翔实的论作。

提高学术性，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除以上三点外，还有许多方面值得注意，如培养锻炼理论思维能力，尤其是求异思维习惯、思辨能力、考证辨析能力等等，都是应当具备的基本功夫。

## 参考文献：

[1]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年版，第 1125 页。

[2] 江少川：《实用写作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9 页。

[3] 汪根年等：《试论高校文科学报的性质》，《浙江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 1 期。

[4] 薛篁：《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特征之我见》，《吉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3—4 期。

[5] 谢延庚：《论文的评审》，见段家峰、孙正丰、张世贤主编《论文写作研究》，台北三民书局 1983 年版，第 525 页。

[6] 王振铎：《关于文科学术论文的鉴审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2 期。

[7] 寇效信：《秦汉乐府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 年第 1 期。

[8] 王英志：《也释“文心雕龙”之“奇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 1 期。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0—23 页。

[10]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79 页。

[11] 朱光潜：《漫谈说理文》，《人民文学》1962 年第 3 期。

[12]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47 页。

[13] 王力等：《怎样写学术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9—50 页。

本文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4 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总论》1992 年第 1 期转载

## 试论学术性与政治性的辩证统一

社会科学的根本属性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客观真知的体系。但在功能上，它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可以发挥很强的宣传舆论作用。从纵横两个方面看，在社会科学学术对于政治确实具有某种独立的品格的同时，还应看到学术与政治不可截然分开的一面。一定的学术必然要受到一定时代政治的影响，受到在一定社会政治条件下生活着的具有一定阶级立场的学者的政治观点的制约。一般说来，作为社会科学学术成果，无论从主观目的还是从客观效果说，都必然表现出一定的政治倾向，起到为一定政治服务的作用。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研究成果，学术性是其基本的属性，是政治性存在的基础；政治性渗透寓于学术性之中，政治性只能借学术性发挥作用。学术性与政治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表现为显型的、隐型的、纯学术型的三种类型。检验学术性与政治性是否达到辩证统一的标准是客观真实、实事求是；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理论联系实际，努力为现实服务。

要对学术性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除了从它自身、从它内部进行研究外，还应进一步考察它与外部的联系，尤其不容回避并需认真加以研究的是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